

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论述^{*}

——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为中心的研究

陈建樾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起点,也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传播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探索的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持续译介和传播,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提供了助力。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不仅完成了对中华民族内涵的界定,而且通过《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定位中华民族国家的完整论述并进而指导了“西工委”关于民族政策的规划。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使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得以初步成型,“中华民族的新社会与新国家”建设由此也得以付诸实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发表后先后经过3次重大的修改,而毛泽东关于“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的论述在1940年提出,至1952年公开刊布,但至今仍关注不够。基于相关历史文献,本文梳理和分析了这一历史进程。

关键词:中华民族 民族国家 多民族国家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作者陈建樾,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6号办公楼,邮编100081。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议题的核心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在这一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把历史国情与中华民族及其解放直接关联起来,“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由于“伟大的斗争需要伟大的力量,团结全民族,发动全民族的一切生动力量进入这个斗争中去,是我们的确定了方针”;因而“我们的任务,是在领导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着空前的历史斗争”。^① 毛泽东这一论述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领导中华民族的指导思想,这同时也意味着,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规划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20ZDGH017)、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百年演进与赓续发展”(项目编号:21STA014)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毛泽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58—659、660页。

路,内在地包含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定位中华民族: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在延安的传播与初步中国化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沙窝会议上明确提出“在许多问题上,马克思列宁史达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我们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最可靠的武器”;因此学习他们的理论与方法“是目前我们全党的迫切任务”。^①

1937年12月,包含“民族问题”一节的《列宁主义概论》由延安的解放社出版,该译本中把列宁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思想对译为10个“原理”。^②1938年3月,由方乃宜从俄文翻译的《马·恩论中国》在汉口的中国出版社和延安的解放社出版;^③同月,在汉口的火炬出版社出版了署名为列宁的《论共产国际》一书,其中收录了《论共产国际与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4月,火炬出版社出版了由李铁兵翻译的《马克思、列宁、史大林论民族革命问题》,该书汇集了1篇马克思的文章、4篇列宁的文章、7篇斯大林的文章以及1篇署名罗易但实为共产国际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案的文章;译者李铁兵在书中指出“民族革命问题是世界革命中最大的问题之一,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必须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然后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现在中国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正在空前的英勇的进行着;凡是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人们,确有研究马克思,列宁,史大林等关于民族革命问题的重要论文之必要”;^④5月,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在汉口的新汉出版社出版,这是苏联出版的《列宁选集》中文版的抽印本。^⑤

1938年底,张仲实在重庆翻译了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其中还特别附录了摘要翻译联共(布)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这本定名为《论民族问题》的斯大林民族理论汇编集,“凡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所有言论,都搜罗在它的里面”,于1939年2月在汉口的生活书店出版,其中第一篇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在“译者的几句话”中,张仲实基于国情指出“我们中国,地广人众,居民的民族构成,也相当复杂,这是人所共知的。所以,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在我们的建国工作中,也占着重要的地位”,因而“以此说来,斯大林的这本书,对于中国读者,实在是有着莫大的参考价值”。^⑥

《论民族问题》所集纳的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深刻地影响到了毛泽东,并引发了他的思考: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能找到并且熟读了这本书,还在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时参考和引用了其中的观点”;1940年5月26日张仲实随朱德到达延安以后,毛泽东和张闻天分别专程亲往招待所与张仲实做彻夜长谈,从谈话中“看得出,毛泽东对苏联哲学界的情况,对苏联的少数民族问题,对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及其观点十分熟悉,他还由这些著作、观点谈到了中国革命,中国

① 《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沙窝会议)》(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36页。

② 斯大林:《列宁主义概论》,解放社1937年版,第70—71页。

③ 赵天鹭:《〈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方乃宜译本考》,辽宁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9页。

④ 李铁兵:《编者前记》,李铁兵编译:《马克思、列宁、史大林论民族革命问题》,火炬出版社1938年版。

⑤ 北京图书馆编:《列宁著作在中国(1919—1992文献调研报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

⑥ 张仲实:《译者的几句话》,斯大林著、张仲实译:《论民族问题》,生活书店1939年第2版。

抗日战争中的许多实际问题”。^① 毛泽东与张仲实这一互动的历史记载,鲜活地证明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已经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所掌握,而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怎样使之中国化的问题。

1936年,后来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在《中国历史教程绪论》一书中,把中国历史的范围厘定为“包括中国各民族的历史”:“现在我们应该把各民族的历史,合起来作成中国史”,这其实已经明确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特性。^② 从1938年5月开始,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杨松在延安马列学院开设了《中国现代革命史》、《民族问题》、《联共(布)党史》等课程。由于杨松长期在东北从事抗日工作又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六大,且参加了《八一宣言》的起草工作,因而对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有较为多的阅读和了解,因此杨松的讲课内容在《解放》杂志上分6期连载。在这个讲课中,杨松根据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以意大利和美国为例指出了“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的概念,并指出“这些国家也受当时历史时代及客观经济的政治的条件之限制,所以这些民族到二十世纪都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而这些国家也都由单一民族国家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多民族国家”;与此同时,杨松在引述斯大林《民族问题与马克思主义》中关于民族的定义之后,不仅分析了作为民族的“中国人”以及中华民族的内部构成,而且明确地把中国视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同时提出“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

从理论上来看:中国人是一个近代的民族。它具有近代民族的一切特征;如像,第一,中国人有共同的民族语言——中国语及中国文。第二,中国人住在中国,中国是中国人的领土,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第三,虽然中国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虽然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然而中国已是一个资本主义相当发展的国家,国内铁路、内河及沿海航路、公路、航空、邮政等等之发展已把中国各地大致上在经济上联系起来,中国人在中国过着共同的经济生活。第四,中国人具有自己特有的民族性、民族文化、民族风俗、习惯等等,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

除此之外,杨松还在讲课中介绍了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和波兰问题的观点,并继续依照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分析了西欧和美国形成近代民族以及“民族建国”的过程。也正是因为看到了国情和时代环境的不同,杨松认为“中华民族谋民族独立谋国家统一的特殊道路”既与西欧法国及北美有别,“也非如苏联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③

由此可见,以“民族问题”为关键词的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经过持续的译介和多种途径的译介与传播,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和专家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得到体现。

在193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安排艾思奇和吴亮平参考苏联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编写《唯物史观》一书。艾思奇在该书的第五章“民族与民族斗争”中征引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并进而认为“在这些民族的特征中,无论把哪一个特征单独拿来,都不足以用来作出民族的定义。而且,只要这一切特征中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足以使民族成其为民族。只有这一切特征具备时,才能成为近代的民族”。虽然艾思奇没有具体地用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去定义中华民族,但从他关于“为着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必须联合全民族的一切反帝力量,组织反帝民族统一战线(如在中国,就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述来看,这本干部教材中也的确包含着对中华民族的界定。在这一章当中,艾思奇还依据列宁的主张和苏联的

① 张复:《从父亲与毛泽东见面赠书说起:也谈善于学习的毛泽东》(上),《中华魂》2010年第7期。

② 吴玉章讲授:《中国历史教程绪论》(1936年前后完成),华北大学,1949年,第73页。

③ 杨松:《论民族(第一讲)》(1938年8月1日),杨松著、刘晶芳编:《杨松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5—348页。

建国经验着重指出了民族自决虽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原则”,但“民族的独立解放,只是使民族脱离了异民族的侵略和奴役”,因此“马列主义所主张的民族自决,不等于提倡无原则的民族分散,建立许多小国。马列主义所主张的民族自决,是指各被压迫民族有脱离帝国主义压迫,政治上完全独立自主的决定自己命运的完全权利。……在民族自决权实现之后,各个平等的民族,可以根据平等自愿的原则来和别的民族联合,形成一个多民族的联盟国家”;同样是依据苏联经验,艾思奇还指出建立民族自治共和国或民族自治区都“是民族自决权彻底实现的一种形式”。^①

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前的1938年4月,张仲实在《抗战三日刊》上撰文建议,为了民族大团结而应当围绕“关于国内民族问题,制定一个具体办法,给蒙藏回诸族同胞一个保证,使他们都能心安愿地为实现一个总目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效力!”。^②1938年底,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基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的政策主轴,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这一论述中不仅隐含着对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定位,也定义了中华民族的内涵,并将这个具有内部结构的中华民族视为“统一的力量”;^③而张闻天在报告中,则提出了“给少数民族以自治权”的主张。^④在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中,中共中央不仅明确地把中华民族与中国这个“整个国家”相关联,而且明确地把中华民族的中国对应于与世界各国一样的“民族国家”:“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坚决相信:具有五千年文化历史,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我伟大中华民族,在全民族团结,国共长期合作的条件下,在日本人民反战反法西斯运动的配合条件下,在全世界爱护和平的民族国家与所有先进人类的同情与援助条件下,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在持久的艰苦的奋斗中,进行反对日寇的胜利的民族自卫战争,驱逐日寇出中国,建立独立自由幸福光明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光明前途已见曙光,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中华民族的。”^⑤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刚一结束,在重庆发行的《群众》杂志就在头版以社论的形式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六中全会的决议及其他文件”的重要意义,并把中国共产党定位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先进男女”。^⑥在同一期上发表的《抗战时期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一文中,时任《新华日报》编辑部主任的章汉夫率先依据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的论述,反驳了少数民族是“已不存在的名词”的观点,并提出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的观点;他还依据列宁的观点和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并接续杨松关于“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的论述,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的论断:

不可否认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境内还存在着像蒙古族,回族(古称突厥族),藏族(古称氐羌族),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像新疆一省内,就有着十四个不同的民族,如“维吾尔、汉、回、蒙、哈萨克、柯尔克思、满、锡伯、索伦、塔塔尔、乌孜别克、塔兰其、塔吉特、归化”等——见陈纪滢先生作新疆的民族大会,载十二月一日大公报)。这些民族,除满人大部分已与汉人同化外,其他各少数民族,仍保持着自己的民族区域,

① 吴黎平(吴亮平)、艾思奇:《唯物史观》,解放社1939年版,第131、141、156—157页。

② 仲实(张仲实):《民族大团结》(1938年4月9日),《张仲实文集》第二卷(上),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9页。

③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19页。

④ 洛甫(张闻天):《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1938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99页。

⑤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59页。

⑥ 《中国共产党六中全会的决议及其他文件》(社论),《群众》第2卷第12期,1938年12月。

这样,我们肯定了中国境内除汉族外,是有少数民族。^①

本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国度),在中国国家内除汉族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的存在,如蒙古族、回族、藏族、苗族、瑶族、侗族、黎族、壮族……等。所谓“中国民族”,可说是中国各民族一个习惯上的总称。汉族是中国各民族中最大的民族,也是文明最早的民族。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中,最古的汉族是中国各民族中最大的民族,也是文明最早的民族。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中,最古的汉族占最大多数,其战斗最久,因此,其对文明的贡献也最大。但是,国内其他一些民族则或先或后,对于文明同样地是做了不少的贡献。^②

基于这些论述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政治部在1939年12月编写的《抗日战士政治课本》指出，“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彝等几十个少数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耐劳，最爱和平的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组成近代的中华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④毛泽东在审阅时认为“写的很好”。^⑤1943年7月，陈伯达在回应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时再次使用了这一论述：“平日我们习用的所谓‘中华民族’，事实上是指中华诸民族（或各民族）。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⑥

① 汉夫(章汉夫):《抗战时期的国内少数民族问题》,《群众》第2卷第12期,1938年12月;另收入《时论丛刊》第4辑,时论丛刊社1939年版,第130页。

是否符合斯大林民族定义的问题,并且进而提出了通过“各个民族平等的发展”和“加强彼此的联系性”来“加速完成中华民族形成”的思考:

中华民族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还没有一个被公认的完全肯定的定论。……我们认为“民族并不是人们之人种上和种族上的共同性,而是人们之在历史上形成的共同性”(斯大林)。这主要的应当是人们在历史上的政治的经济的利害共同性,因此,在中国长期历史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今天的实际的政治经济生活里,中国境内各民族实已有了成为一个近代民族的统一的基础,就是说,他们业已在实际生活和斗争里,特别是在三年来英勇的民族抗战中,表现出了共同利害的一致性。……斯大林所下的民族定义,并不是木制的箱子,要我们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讨论任何一民族问题时,都把这木箱子,试装一下,放的下才去,才成为一族;不是这样,相反的,马列主义所要求我们的,是一个原则具体的活的应用。那么,讨论中华民族问题时,就应根据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的地位来考察中华民族!那么,我们说的不违背斯大林所下的民族定义的根据又究竟在哪里呢?那就是因为中华民族的这个形成过程,今天还没有完结,相反地是正在继续着,这应当是问题的最中心的地方。现存的各个民族底特征的溶合,中华民族的最后形成,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过程。因此,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中国境内各个民族底现存的特征,也不是固定的永久不变的,相反地是正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我们不应当把它当作一种走向消溶的历史的过渡性的东西。

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是包括中国境内各个民族,是不是就因此抹杀了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特殊性而不顾呢?不的,中华民族还没最后形成,中国今天还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自然我们是承认中国少数民族的问题了。因此,我们是极力主张各民族的平等,极力反对民族底特权,否则,便是最大的培养和助长民族的偏狭性,便是最大的历史的反动。在今天来说,民族特权的结果,只不过是更多的给我们敌人制造挑拨和分化我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缝隙。要加速完成中华民族形成的这个过程,只有取消一切民族底特权,各个民族平等的发展,加强彼此的联系性,才有可能。^①

二、定位中华民族的国家:《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及其修改

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的发刊词中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个“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并对全党提出了巩固“全国性的大党”“群众性的党”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任务。^② 由于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势必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一步中国化,一个“群众性的党”就要求进一步“团结各民族于一体”,“全国性的大党”就要求思考和解决全国性的问题,其中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国家的定位就是不能忽略的问题。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就代表中央要求在高级党校开设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与中国问题、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并规定“由中央直接办理”。^③ 根据李维汉的回忆,延安干部的学习教材有两个来源,一是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和苏联的教科书;二是中共自己编写的教材,“最早编了一本《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后来又编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④ 1939年冬,毛泽东与张闻天、李维汉合作撰写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作为“供

① 《关于“中华民族”问题》,《抗敌报》1940年5月30日。

②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3—606页。

③ 洛甫(张闻天):《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1938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11页。

④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34页。

各学校、各训练班教课及在职干部自修学习之用”的课本。《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原计划为三章,第一章“中国社会”由张闻天、李维汉起草,由毛泽东修改定稿;^①第二章“中国革命”由毛泽东撰写;拟定的第三章“党的建设”,李维汉完成了其中两节并送毛泽东看过后“因情况变化中止了”。^②包括两章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最早发表于1939年12月15日出版发行的《共产党人》第4期,并在第5期连载。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以“中华民族”为题名的第一节从中国的地理方位、疆域所及、人口规模、民族构成、历史沿革等多个方面对中华民族进行了解析;第二和第三节则以“古代的封建社会”和“现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分别叙述了中国社会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脉络。在这一章中,中华民族的内部结构被表述为:“在这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为汉人。此外,还有回人、蒙人、藏人、满人、苗人、夷人、黎人等等许多少数民族,虽然开化的程度不同,但他们都有了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在充分阐明中华民族内涵的基础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国家”。

在1939年底发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之后,毛泽东在1940年1月9日发表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这篇在发表时改名为《新民主主义论》的文章中,毛泽东对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进行的分期和论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与新国家”的奋斗目标,并对未来“新国家”的国体和政体进行了规划和展望。在其中关于民族问题的部分,毛泽东专门摘录了由张仲实翻译的《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来说明“民族问题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点,已不再是一般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已经变成一般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③毛泽东的这一论述不仅意味着民族问题被视为中国革命必须处理和解决的问题,而且意味着民族问题的解决之道将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去处理。

1940年5月,陈公琪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相关文章和共产国际的纲领编译为《论弱小民族》一书,署名丁宗恩由上海的“北社”出版。^④也就是在这期间,毛泽东在审读《抗日战士战争课本》时透露正在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修改。^⑤根据曹雁行对相关手稿的研究,毛泽东在1940年“6月以后,11月以前”对该书做了大量修改,并收录于1940年11月内部印行的《党建文集》中。^⑥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在1939年底首次发表后,经历了1940、1952和1991等3次修

① 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青岛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页;张启华、张树军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发展史》上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页。另据《张闻天年谱》,张闻天分工负责完成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章第三节,其文字底本是发表于1931年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因此可以判定第一章的第一、二节是由李维汉起草完成的。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24页。美国学者怀利推测陈伯达参与了第一章的起草,但似无相关证据。参见[美]雷蒙德·F·怀利著,杨悦译、萧延中校:《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页。

②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35页。

③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0页。

④ 胡永钦、狄瑞勤、袁延恒:《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概述》,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4页。

⑤ 毛泽东:《致萧向荣》(1940年),《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7页。

⑥ 曹雁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修改述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毛泽东重要著作和思想形成始末》,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改,其中1940年版和1952年版修改的最多。由于对第一章第三节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及毛泽东撰写的第二章的修改已有很多的研究,^①因此本文仅就第一章第一、二节中有关“中华民族”的部分核心论述,归纳毛泽东的修改情况(详见表1):

第一,把中华民族的内部民族结构从“回人、蒙人、藏人、满人、苗人、夷人、黎人等等许多少数民族”修改为“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同时确认“中国是一个有少数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各族”,这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少数民族的名称、数量等有了更深入的认知;

第二,把关于“中国人”的中国概念改为“中国各民族”和“中国人民”,这意味更加清晰而鲜明地把“中国各民族”和“中国人民”都对应于“中国”;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修改,出现在第二节的第一句,即把“中国虽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国家”调整为“中国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华民族视为“国家民族”。

经由上述的修改,“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和“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定位的完整论述;这一论述在1940年就已经完成,它虽然没有立即公开,但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定义中华民族、定位中华民族的国家以及规划中华民族的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

从“民族的国家”到“民族国家”的修改,是对中华民族国家定位的提升与精准,毛泽东从1940年开始的这一修改,历经1952和1991的三个版本中都不再改变,这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定位的清晰化和坚定性。始自杨松、经由章汉夫、陈伯达到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这一基于“一与多”、“内与外”、“上与下”的国家定位,更为完整准确地释读和解决了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国家在“一”与“多”方面的问题。

表1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一、二节有关“中华民族”内容的部分修改情况

出处	《共产党人》第4期	《党建论文集》	《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版第2卷	《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第2卷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2卷
时间	1939年12月	1940年11月	1948年5月	1952年3月	1991年6月
地点	延安	延安	哈尔滨	北京	北京
篇名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修改1	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海、陆、空与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的生存和中国的革命。	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海、陆、空与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的生存和中国的革命。	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海、陆、空与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的生存和中国的革命。	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迫害着中国人民的革命。	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迫害着中国人民的革命。

① 例如,(日)竹内实监修:《毛泽东集》第7卷,1971年第一版(北望社)、1983年第二版(苍苍社);蒋建农、边彦军、刘敏、张素华:《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王涣娟:《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修改》,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欧阳军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导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

修改 2	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回人、蒙人、藏人、满人、苗人、夷人、黎人等等许多民族,虽开化的程度不同,但他们都有了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回人、蒙人、藏人、满人、苗人、夷人、黎人等等许多民族,虽开化的程度不同,但他们都有了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回人、蒙人、藏人、满人、苗人、夷人、黎人等等许多民族,虽开化的程度不同,但他们都有了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修改 3	中国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虽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与优秀遗产的国家……	中国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虽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与优秀遗产的国家……	中国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虽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与优秀遗产的国家……	中国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虽然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	中国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虽然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

资料来源:《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第4期,1939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党建论文集》,党建论文集编辑委员会,1940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东北书店1948年版;《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从“民族的国家”到“民族国家”的修改,毛泽东显然既没有否定也没有改变“多民族国家”的定位,而只是缘于语境的不同。1943年,在毛泽东亲自修改并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党推荐^①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文中,中华民族为被明确地定义为“中华诸民族(或各民族)”^②。在毛泽东看来,这个国家显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作为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中华民族是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因此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也是中华民族的国家,即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

从“民族的国家”到“民族国家”的修改,毛泽东的用词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定位的系统性认知。由于中华民族是“一体层次的民族”,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多元层次的民族”,^③因此从“一”与“多”的关系看,中华民族是“一”,各个民族是“多”;在“外”与“内”的关系上,中华民族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意义上的“外”,作为中华民族内部结构的各民族是这个民族国家的

①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多次指示在党内外公布和“多印广发”此文,并要求“继续广播评《中国之命运》各文”,“以便在全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警示“国民党思想在我们党内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的”,毛泽东:《关于公布〈评〈中国之命运〉〉一文》、《关于审干的九条方针的在敌后的八项政策》、《关于发动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运动给董必武的电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3、64页;另见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70—73页。

② “平日我们习用的所谓‘中华民族’,事实上是指中华诸民族(或各民族)。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1943年7月21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1949)》,第945页。

③ 叶江:《多民族国家的三种类型及其国家认同建构问题——民族学研究的视角》,《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内”；在“上”与“下”的关系方面，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是各民族的上位概念，各民族则是中华民族的下位概念。还是因此，中共在中华民族的新中国建立之后，更多地对内强调“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及“各民族”的大团结、大家庭。

由于《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在1940年的修订版仅发表于党内少数高级干部可见的《党建论文集》中，就连为中共七大准备且由毛泽东亲自选编的《六大以来》也没有收录；而在1942年军队干部政治教育中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课程中，虽然包括了《〈共产党人〉发刊词》、《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但唯独缺少《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①1944年，晋察冀日报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收录了1940年修改后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②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先后被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收录，并发行了多种单行本。^③1952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经再次修改后在《毛泽东选集》中正式刊布。

归纳而言，在对外意义上，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而在对内意义上，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情和国家定位的完整论述，这一在1940年就已完成的论述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个最鲜明的特征。通过对1939、1940、1948、1952、1991的五个版本的文字比较可以发现：毛泽东在1940年的修改，一直到在1948年得以部分传播，到了1952年才得以正式公开，这在客观上使得“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的论述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论述则更多地被世人所熟知。

三、规划中华民族的民族政策：“西工委”的两个“提纲”与两个“问题”

在中共中央的组织系统内设置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机构，始于1929年5月建立的少数民族委员会，由采桢和任弼时先后担任总负责。^④红军初到陕北时，中共中央就针对陕甘宁周边的民族情况组建了蒙古工作委员会和定边工作委员会；1937年7月后成为少数民族委员会下属的回民工作部和蒙古工作部。^⑤根据六中全会关于“在全国起模范的与推动的作用”的要求，^⑥六届六中全会甫一结束，中共中央就多次在关于内蒙古的指示中明确要求在民族工作中采取“正确的民族政策”并且“做成模范”：“我们党与八路军在绥蒙工作的任务：是要去唤起和团结蒙汉一切力量，一致联合抗日，是要以我们正确的扶助境内少数民族解放政策，去帮助各方消除蒙汉间的对立，是要以我们坚持抗战的模范作用，去提高蒙汉军民王公官吏抗战必胜的信心，是要广大的展开绥蒙抗日游击战争，把绥蒙全境造成敌人不可征服，不能巩固统治的游击区，逐渐在将来敌我力量的变动中，形成坚强的抗日根据地，形成我反攻阶段的前进阵

① 《中央军委、军委总政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第三号）——政治教育》（1942年2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330页。

② 刘金田、吴晓梅：《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前前后后》，台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33—34页。

③ 蒋建农、边彦军、刘敏、张素华：《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上册第257页、下册第1652—1656页。

④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⑤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347—348页。

⑥ 洛甫（张闻天）：《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1938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79页。更多的研究，详见杨思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少数民族委员会考述》，《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地”；^①“团结蒙汉人民联合抗日，以我们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来改变中国过去传统的错误政策，我们做成模范来推动影响国民党，首先是傅作义的转变”。^②

1938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由张闻天兼任主任，李维汉任秘书长，贾拓夫任秘书；^③而在1939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各局各省委各特委还无统一战线部的应尽快成立”，同时要求有少数民族的地方，统战部“须调查和研究少数民族情形”。^④

“以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为武器，系统地研究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并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则是从西工委开始的”。在这一任务的要求下，“西工委”专门设立的民族问题研究室，对少数民族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周边的蒙古族和回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进行了专项调查，“做出合乎实际的结论，为党中央制定民族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根据李维汉的回忆，“西工委”为了搜集资料，跑遍了西安的所有书店，甚至把毛泽东手里有关民族问题的藏书也借来了，“在延安已经是独一无二的少数民族问题的资料室了”。^⑤在这一基础之上，贾拓夫、刘春和李维汉等人先后组织了实地调查，完成并发表了一批调研报告和文章。

1940年2月，贾拓夫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中华民族的完整论述在《团结中华各族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一文明确地把中华民族定义为“各个民族组成的一个总体”，并从共同命运的角度论述了国内民族政策的理据：

中华民族是由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藏、维吾尔、苗、瑶、夷、番、各个民族组成的一个总体，因此，中国抗战建国的彻底胜利，没有国内各个民族的积极参加，是没有最后保证的。

.....

整个中国对帝国主义来说，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但在国内各民族关系上，同时又存在着互相压迫的现象，主要是大汉族主义者对其他民族的压迫，这种压迫，造成中国历史上不断的残酷的民族斗争。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侵略，则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是无从谈起的，在这一点上，国内所有各民族的命运是完全一致的。但同时要想动员全中华民族的力量以战胜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压迫，如果不取消大汉族主义者的压迫而以正确的方法来解决国内各民族间的关系问题，同样也是不可能的。

贾拓夫这篇文章之所以值得特别抄录，是因为这篇文章实际上为“西工委”的相关研究设定了基调和主轴。在贾拓夫看来，“要团结国内各少数民族到坚决抗日的战线上来，为实现各民族亲密的团结一致与共同的抗战建国，基本的关键在于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为此他在文章中开列了“团结中华各族一致抗日”、“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主改革和民生改善等三大政策主张。^⑥

在1940年6月发表的《回回民族问题研究》中，担任“西工委”秘书长的李维汉则在引述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之后，肯定地把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视为民族国家的一个类型：“在现代的民

① 《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1938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1949）》，第612页。

② 《关于建立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及党的政策的指示》（1938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88页。

③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3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④ 《中央关于统战部工作的指示》（1939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3页。

⑤ 以上均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348—349页。

⑥ 关烽（贾拓夫）：《团结中华各族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1940年2月），《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1949）》，第816—818页。

族国家之外,还有一种多民族的国家,而在多民族国家里,包含着没有来得及在经济上结合成为一个完整民族的民族。”^①李维汉这个论述,被原原本本地照录在《回回民族问题》当中。^②

根据刘春的回忆,在展开对回回民族问题的研究之前,中央曾经指定王若飞起草了一个报告。^③“西工委”在研究中,围绕刘春起草的《回族在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中的地位》进行了内部讨论,并参考了王若飞的报告。基于刘春的文章和相关讨论,“西工委”由刘春执笔完成了“约有一万多字”的研究报告,后由贾拓夫压缩成《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并上报中央;据回忆,当年上报时曾经把《回族在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中的地位》一文“附给中央作参考”。^④

从《团结中华各族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回族在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中的地位》《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回回民族问题研究》到《回回民族问题》,“西工委”这一系列调查研究和撰述过程,不仅是一个链条上的递进过程,也是一个由下而上的民主与集中的过程。在现在看来,这一工作对中共民族政策的制定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的形成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完成《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之后,“西工委”还以此为范本完成了《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在同样“基本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⑤后,这两个“提纲”又成为撰写《回回民族问题》和《蒙古民族问题》的思想指导和写作纲要。

“西工委”这一系列著述,很多表述中都透射出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深刻影响,例如在《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中,“西工委”就直接按照列宁关于沙皇俄国的论述句式指出清朝的统治“是中国各民族的最黑暗牢狱”。^⑥又根据刘春的回忆,虽然他在《回族在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中的地位》提到了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但在提交毛泽东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中却“只写了反对大汉族主义,没有写反对狭隘民族主义”;^⑦而在经中央书记处“基本上”批准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中,则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补齐了“肃清大汉族主义的传统,纠正狭隘回族主义的倾向”的论述。在《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中也写有“从上而下地彻底肃清大汉族主义的传统与狭隘的民族观点”的内容。^⑧这一论述后来先后被纳入《共同纲领》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历部宪法当中,由此也成为新中国民族政策话语中关于“两个民族主义”定义的“模板”。

与此同时,“西工委”的研究又并不囿于经典作家论述的局限。根据刘春的回忆,“西工委”内部在关于两个“提纲”的讨论中先后出现了“根据斯大林关于现代民族的四个特征”而认为“回回是不是一个民族”和“蒙古族不是一个民族”的争论。“西工委”讨论的结果突破了斯大林民族定义,在两个“提纲”中频繁使用了回族及“回回民族”、“蒙古民族”的概念,并明确他们都是“中国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在民国初年,中华民国政府内政部就明确地把回族定位于“回教”群体,甚至对“回民”的称

① 罗迈:《回回问题研究》(1940年6月16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1949)》,第851页。

② 民族问题研究会编:《回回民族问题》(1940年),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第97页。

③ 刘春:《关于民族工作的回顾》(修改稿),未刊本,2001年,第27页。

④ 刘春:《回族在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中的地位》题记,刘春著、刘俊选编:《刘春民族问题文集》,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⑤ 《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1940年4月25日)、《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1940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370、443页。

⑥ 《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1940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372页。

⑦ 刘春:《关于民族工作的回顾》(修改稿),第28页。

⑧ 《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1940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43页。

谓都认为“未免失实”；^①而中国共产党早在建党初期的1928年，就在党的决议中把“回族”列为“中国少数民族”。^②在《回回民族问题》中，“西工委”在开篇就明确指出“否认回回为一个民族，将回回民族问题简化为宗教问题，将回回问题的解决简化为汉化教育问题”，“这是大汉主义的标本”。^③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始终地把回族视为组成中华民族的一个少数民族并解除其与宗教的捆绑。

在基于《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而完成的《蒙古民族问题》中，“西工委”还同时认为国共两党的边疆治理政策是“两条道路，两种问题的提法，两样民族政策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并且继续在实行自己的主张”；“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者的论调是这样的：既然蒙古问题只是边疆问题，内蒙边疆就应无条件的服从中央”；“因此大汉族主义一贯的政策是：重边政，宏教化，以巩固国族，而成统一”；“这里的宏教化，就是要实行同化教育来同化或感化‘边民’，而不是实行民族平等去团结他们”。“西工委”这些研究和著述，不仅为“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与新国家”提供了在民族政策方面的政策规划，也在1943年围绕《中国之命运》展开的论战中发挥了作用：由于这个论战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怎样定义中华民族和认识中国的“民族国情”，^④因此《蒙古民族问题》就此特别指出：“最近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出版，根本否认了有蒙古民族，既然没有蒙古民族，哪里还有蒙古民族问题？于是他就把任何蒙古问题都完全抹杀了。”^⑤

因为都是“中国的少数民族”，所以“西工委”两个“提纲”中提出的民族政策都提出了处理和解决相关民族问题的政策路径，即“各民族在平等原则之下共同抗日”并建立“统一”的“新共和国”，^⑥虽然在具体文字上稍有不同，但意思是几乎完全一致的。而同样是因为都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两个“提纲”也都在民族关系中强调了各民族“平等亲爱”或“一律平等亲爱”的精神，这实际上为中国共产党在学习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发展民族关系中的“大家庭”理念提供了逻辑前提：早在1874年，恩格斯在论述波兰问题时就提到过“欧洲各民族大家庭”；^⑦而在十月革命爆发前夕的1917年8月，斯大林提到了通过民族自决权把各民族“联合为统一友爱大家庭”；^⑧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在“团结各民族为一体”的逻辑下，提出把中国的少数民族通过抗日战争“汇合在一起”；^⑨1940年底，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彭真在《解放》周刊撰文认为晋察冀边区的民族政策“在全民抗战的烽火里，我们边区境内各民族，保持了亲密

① 为金峙生等组织回族联合会请求立案事的《内政部批稿》（1912年2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7页。

② 在1928年，中共六大在决议中明确地把“北部之蒙古，回族，满洲，高丽人，福建之台湾人，以及南部苗黎等原始民族，新疆和西藏”确定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并指出他们“对革命有重大的意义”。见《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88页。

③ 《回回民族问题》（1941年），《序言》。

④ 周锡瑞、李皓天主编，陈骁译：《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64页。

⑤ 民族问题研究会编：《蒙古民族问题》（1946年），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3页。

⑥ 《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1940年4月25日）、《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1940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370、380、443页。

⑦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187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1页。

⑧ 斯大林：《反革命和俄国各民族》（1917年8月13日），《斯大林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96页。

⑨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0页。

的团结,破除了彼此间的隔阂”,同时“使边区成为各民族共同生息的快乐的家庭”。^①

基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西工委”的两个“提纲”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讨论和修改,中共在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架构上也出现了变化:“根据《提纲》的精神,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在少数民族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回民和蒙古族人民在他们聚居的地方实行自治”;^②1941年1月15日,《解放》周刊在《论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政策》中提出“对于少数民族,则我们给以平等的待遇,尊重民族自决权的原则”;^③但到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正式提出了根据民族平等原则来“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的施政方针;^④6月,新创刊不久的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在社论中将建立蒙回自治区的施政纲领定义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共同抗日的唯一正确的民族政策”。^⑤

1943年7月8日,曾经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致闭幕词的王稼祥在《解放日报》撰文提出了“正确道路”:“回顾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的历史,便是为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斗争史,也是寻找、确定和充实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历史”;“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中而形成起来的。它既不象那些简单抄袭书本搬运理论,把理论当教条而自命为马列主义,把主观主义当作马列主义,也不象那些以中国人民民族意识来投机,抄袭一些中国封建时代的古书,同时偷运一些外国最反动的法西斯思想而自命其理论为中国‘本国货’,把封建思想与法西斯主义当作中国民族解放的理论。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⑥

四、结 语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历史条件下去“创造自己的历史”。^⑦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道路和实践,同样是在给定的中国国情和中国历史环境下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国情的过程,它既是一个理论探索的过程,也是一个将理论付诸实践的过程,因而更是一个组织与汇聚民众力量的过程,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与大众化。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同步地,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同样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后展开思考和探索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重要知识来源,也成为一系列探索与实践的指导原则。“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因此历史地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应用于多民族的国情当中,并且“不应割断历史”地采取适合这一国情的解决方案和制度模式。

① 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的施政纲领》,《解放》周刊第119期,1940年11月16日。

② 周维仁:《贾拓夫传》,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③ 《论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政策》(1941年1月15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1949)》,第673页。

④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93页。

⑤ 《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1941年6月22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1949)》,第681页。

⑥ 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解放日报》1943年7月5日。

⑦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9页。

在马克思看来,“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而“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① 作为中华民族的忠实利益代表者,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观察、缜密思考和探索创新,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与新国家”等关键话语为标志的核心理念,这一具有体系性的思考准确地处理和解决了“中华民族与各个民族”,“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等诸多事关近代以来国家—民族议题的重大事项,提出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指导中华民族实现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使得“中华民族的美好大家庭”^②由此得以确立。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结合中国国情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而非“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而既是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过程,也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也正是经由“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又把政策交给群众”^③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各界和各民族中都获得了积极的响应和支持。

具体到关于中华民族的思考与国家定位方面,“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的判断,也是一个在思考和讨论中不断递进发展的过程:杨松提出了“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章汉夫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陈伯达则归纳为“一个习惯上的总称”,而所有这些都在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团结各民族于一体”的论述指导下逐渐聚焦;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的修改中,毛泽东完成了定位中华民族国家的完整论述,在对外意义上把中华民族的国家定位于“伟大的民族国家”,而在对内的意义上则依据中华民族的内部结构把中国定位于“由多数民族组成的国家”也就是多民族国家。

“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④由本文的梳理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创造新理论的历程,始自六届六中全会,而关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国家的定位以及民族政策的规划,也是以六届六中全会为枢纽展开的。

〔责任编辑 贾 益〕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10页。

②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

③ 毛泽东:《彻底纠正五风》(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0页。

④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9页。